

思想

REFLEXION 22

走過八十年代

李元貞 / 回顧台灣婦女運動

陳素香 / 社會運動三十年的片段

吳介民 / 革命在他方

陳宜中 / 改革的歧路：訪朱嘉明

蕭阿勤 / 世代、理想、衝撞：訪林世煜

李勇 / 自焚與身體政治學

章 / 綠色小組

劉 樟 / 日本的釣魚台險棋

105
843
V.22

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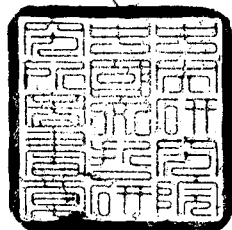
REFLEXION 22

走過八十年代

中研院文哲所圖書館



3 0580 0 0297224 3



編輯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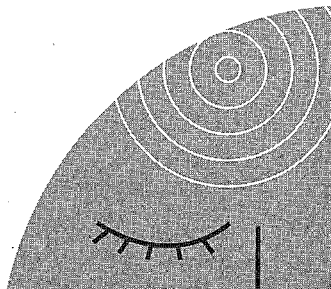
總編輯：錢永祥

編輯委員：王超華、王智明、沈松橋、汪宏倫
林載爵、周保松、陳宜中、陳冠中

聯絡信箱：reflexion.linking@gmail.com

網址：www.linkingbooks.com.tw/reflexion/

新浪微博帳號：<http://www.weibo.com/u/2795790414>



目次

燃燒的身體與身體政治學： 關於部分藏人持續自焚的思考

姚新勇.....1

對於年輕生命自焚的鼓勵與美化，不只是在伸張正義，也可能是在召喚更多年輕的生命燃入烈火之中。本來並無深仇大恨的藏漢人民，難道終將無法挽回地走向相互仇殺之境嗎？

大眾文化的百年迷思

唐小兵.....23

大眾文化是一個社會或者說文化概念，而群眾文化則是20世紀中國的一個政治概念，兩者何時疊合，何時分流，何時對峙，端視政黨機制和意識型態的需要而定。

思想訪談

中國改革的歧路：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35

唯有回到1980年代，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歷史遺產作為各方現實力量的妥協基礎，完成胡、趙在1980年代本來要做的事情，把背離這個目標的東西做出調整，才是最現實、最理性的當前出路。

走過八十年代

(一) 個人、運動與時代

追求國族：198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

蕭阿勤..... 85

在1970年代的基礎上，1980年代的台灣，走上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運作，開始「重構台灣」。

播種與茁壯：回顧1980年代台灣婦運

李元貞..... 111

1980年代的台灣婦運，尤其是新知，所提供給後輩的是組織婦女集體力量的成功，是由婦女集體的智慧來解決婦女問題的成功。

世代，理想，衝撞——1980年代：林世煜先生訪談錄

蕭阿勤..... 133

我們的核心價值有三個，第一個台灣，第二個是主體、主權，第三就是民主與進步。

革命在他方？此刻記憶1980年代

吳介民..... 157

陳映真的左翼教義，是建構在中共革命的進程上，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則建構在反帝國主義侵略上。這種左翼信念，在實踐中腐化或壓迫他人而遭遇批判時，可以在不斷上網的反帝鬥爭中得到正當化的辯解。

夢想共和國的反挫：1980年代的個人備忘錄

黃崇憲..... 179

青春，是一份不可思議的禮物、生命中唯一的奇蹟。她是如此之美，也如此、如此之短。青春，也是最昂貴的單程車票，因為她一去不回頭。

(二) 文藝與政治：紀念吳耀忠

以文藝進行社會實踐

陳瑞樺·····199

為了替畫家寫下生命故事，為了追溯台灣戰後現實主義文藝的流變，為了理解台灣左翼精神的發展，由此展開的一段追尋……

八〇九〇二千以及之前和之後

陳素香·····205

本文從與現實主義畫家吳耀忠相遇的1980年代寫起，意外的寫成置身台灣社會運動三十餘年的片段經驗。

綠色小組的社會實踐：為懷念吳耀忠而作

王智章·····249

吳耀忠走了二十五年了，懷念他的同時，我的腦海中不斷的湧現綠色小組的畫面……

霧中的浮光：吳耀忠

楊 渡·····263

我們同一個時代的人，經歷了同樣的成長歷程，有一些共同的生命經驗，自己的實踐與反省，或者可以供做參考，於是做了這樣初步的記錄文字。

鄉土的養分

徐 璐·····273

很謝謝從1960、70年代一路走過來的前輩，他們已經把土壤一再翻土、灌溉，這些土壤的養分，讓我們甚至更年輕的一代有可以發揮的空間。

思想評論

日本釣魚台「國有化」騷動的深層

劉 樟.....283

日本之所以走這一著險棋，是由一系列遠因、近因綜合發酵的結果。其中，既有日本「內急」的因素，也有作為「外因」的中方的刺激。

智利的群眾、市場和民主

葉 攀.....291

公民社會的提倡者們，尤其是強調公民社會的公共性的那些提倡者，如何保證自己的理念在現實中貫徹，顯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你爲何不熱衷自由主義？

曾瑞明.....303

在書店瞥到《為何知識分子不熱衷自由主義》的書名，生起幾種思緒。

思想人生

陳之藩：思想散步

李懷宇.....311

在「專才」成群而「通才」寥寥的時代，陳之藩是東方的「文藝復興人」。

致讀者.....327

追求國族：

1980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

蕭阿勤

1970年代的台灣，在政治上開始「回歸現實」，在文化上「回歸鄉土」。當時挑戰既有體制的主力，是在戰後成長而涵蓋本、外省籍的年輕知識分子。他們深受1970年代初台灣外交挫敗的刺激而覺醒轉化，揚棄流亡漂泊的心態，形成我所謂的「回歸現實世代」。他們基本上仍然是在中國民族主義的視野或參考架構下發現鄉土、看到台灣，也傾向於體制內的革新與民主¹。

1979年底的高雄美麗島事件，無疑是1970-80年代轉折激變的最重要因素。1980年代之後，以本省人爲主的「黨外」與民主進步黨領導的政治反對運動積極宣揚台灣意識，使台灣民族主義運動顯著發展。1970年代的回歸現實世代當中，以本省人年輕一代爲主，發展鄉土文學、挖掘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加上黨外的台灣歷史探索，這些都替後來的台灣意識、台灣民族主義準備了素材、奠下基礎。在這種1970年代的基礎上，1980年代的台灣，走上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運作，開始「重構台灣」²。

1 參見筆者的《回歸現實：台灣一九七〇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0，第二版)。

2 本文以下的討論，大致根據筆者即將出版的《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2012)一書。

1988年，本省籍的李登輝繼承蔣經國，成為國民黨主席與總統。在國民黨的黨國決策階層中，本省籍的人數逐漸超過外省籍者。1991年，原本於中國大陸選出的第一屆未定期改選之中央民意代表終止行使職權，國會全面改選。1990年代初，黨內反李登輝的「非主流派」與親李的「主流派」鬥爭而失勢。以外省籍年輕一代為主而反李、懷疑他傾向於支持台灣獨立的國民黨內「新國民黨連線」人士，於1993年另組「新黨」，與民進黨及其他支持台灣民族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激烈。1996年，台灣舉行戰後首次的總統民選，國民黨候選人李登輝獲得過半票數而連任。在這種政治變化中，過去由國民黨威權統治所教化、基於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集體記憶、文化象徵等，在國家的文化教育政策與公共領域的文化論述中，都備受挑戰。

在當代台灣的歷史上，1980、1990年代，是台灣政治與文化的「本土化」、「台灣化」的關鍵時期。就文化的轉變而言，這個二十年左右的階段，是台灣民族主義在文化界傳播發展的高峰。追求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建立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文化等理念，亦即「台灣文化民族主義」(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從少數人的提倡，逐漸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與台灣政治的轉變互相激盪，使台灣的文化面貌產生重大變化。在這個二十年左右的光陰中，台灣民族主義對文化界的改變，最顯著、最值得關注的是文學、語言、歷史這三個領域。台灣文學的成立、台灣本土語言運動的興起、台灣史觀的發展等，是文化的本土化、台灣化的領頭羊，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的主要部分。1980、1990年代與國族有關的文化政治變化，是當代台灣一段令人驚歎不已的歷史，我們仍然都在它的重大影響下前進，因此必須有比較完整而清楚的理解。本文限於篇幅，下面就讓我們將回顧的重點放在1980年代。

確立民族文學與民族文化

美麗島事件導致了政治反對運動的激進化，也激發了文學的政治化。以1964年創辦的《台灣文藝》雜誌和《笠》詩刊為中心所集結起來的本省籍作家和評論家，在其中扮演著關鍵角色。鄉土文學論戰在1978年初停息後不久，王拓與楊青矗這兩位主要的鄉土小說家就放棄文學生涯而投入政治反對運動。兩人都成為1978年底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的黨外候選人，但這次選舉因美國突然與台灣斷交而停辦。王拓與楊青矗後來加入黨外的《美麗島》雜誌團體，並且因為涉及美麗島事件而入獄。這個事件深深影響了《笠》與《台灣文藝》作家。他們許多人，例如鍾肇政、李喬、宋澤萊，都曾表白這個事件使他們的政治意識覺醒，並且認識到國民黨統治的獨裁性格。上述三人，正分別代表戰後第一、二、三代本省籍小說家受美麗島事件的深刻影響。對笠詩社的重要詩人來說，例如鄭炯明與李敏勇，也是如此。

美麗島事件的影響，使《笠》與《台灣文藝》作家開始觸碰各種敏感的社會、政治議題，例如關於二二八事件的記憶、反共戒嚴下的社會生活、國族認同的問題等。從1980年代初開始，這些小說家與詩人的作品用隱微的或明白的筆法，抗議國民黨的統治。就像當時擔任《台灣文藝》社長的陳永興所指出的，小說家與詩人受到黨外對國民黨挑戰的激勵，使得《台灣文藝》「在尺度上也比過去的二十年有很大的突破，……沒有任何題材是不能寫的，沒有任何作品是不敢登的……。」³笠詩社與《台灣文藝》列名的「本社同仁」、

3 《台灣文藝》91期(1984)，頁32。

社務委員、編輯委員、作者群等，幾乎都由本省人組成，兩個刊物作家作品中的抗議，無疑有強烈的族群政治意涵。在1980年代上半葉，這兩個作家群開始與黨外發展公開的密切關係。楊青矗與王拓在1983年12月與1984年11月分別出獄後，都加入《台灣文藝》而成爲其同仁。1982年初，三位笠詩社與《台灣文藝》的資深成員鄭炯明、曾貴海、與陳坤崙，在高雄創辦了《文學界》(1982-1989)。在1980年代，這份新的文學刊物與《笠》、《台灣文藝》，一起成爲以笠詩社與《台灣文藝》成員爲主的本省作家、文學評論者建構「台灣文學」概念的主要園地。

當笠詩社與《台灣文藝》成員及其作品愈來愈政治化，關於「台灣文學」定義的議題，對他們而言也愈來愈重要。文學生涯橫跨日本殖民與戰後時期的本省籍資深作家葉石濤，曾在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期間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文，認爲台灣鄉土文學應該是基於台灣意識而寫出的作品。他的觀點引起陳映真的批評。與《台灣文藝》關係密切的年輕一代如高天生、彭瑞金與陳芳明的文學評論，繼承葉石濤的看法，在1980年代上半葉台灣文學概念政治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和葉石濤早期的看法比較，他們的論述呈現了將台灣文學「去中國化」的傾向。

高天生等《台灣文藝》年輕一代成員對台灣文學的重新定義，從他們對所謂「邊疆文學」說法的批判開始。1981年1月，本省籍的知名評論家、當時爲《中國時報》藝文組主任的詹宏志，在一篇討論報紙小說獎得獎作品的文章中問道：「如果三百年後有人在他中國文學史的末章，要以一百字來描寫這三十年的我們，他將會怎麼形容，提及哪幾個名字？」這篇評論認爲，戰後台灣所有的文學創作可能都是徒然的，因爲這些作品未來很可能都被貶入「邊疆文學」

的範疇⁴。詹宏志的觀點很快引起高天生的批評。和葉石濤的觀點相近，高天生並不否認「台灣文學乃中國文學的支流」。不過他強調由於台灣文學本身特殊的歷史發展與性格，因此它必須被視為一種獨特的傳統；評判台灣作家的作品必須基於台灣文學本身的歷史角度，而不是從中國文學史的觀點⁵。彭瑞金則認為只要作家在意識上認同於台灣這塊土地、關愛這裡的人民，而其作品真誠反映人民生活的歷史與現實、植根於這塊土地，那麼便可以稱之為台灣文學。他強調這樣的「檢視網」，亦即檢視或篩選的標準，稱做台灣文學的「本土化」特質，而本土化是台灣文學建設的基石，也是台灣文學最主要的課題。彭瑞金相信這種精神特質的存在可以檢視「三百年來自荷鄭以降的所有台灣文學作品」，證明台灣文學是一個獨立而完整的文學脈流，亦即「『台灣文學』的承傳確定我們是有詩有歌的民族，我們在這裡可以找到我們是個有自己文學的民族的自信」⁶。至於陳芳明則以筆名宋冬陽在《台灣文藝》發表〈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重新檢視葉石濤與陳映真在鄉土文學論戰期間所提出來但未受重視的不同觀點。他認為葉石濤的「台灣(鄉土)文學」概念是基於健全的「台灣意識」，而陳映真的「在台灣的中國文學」概念則反映不切實際的「中國意識」，兩者無法並立。他認為任何認同台灣的作家必將致力追求台灣文學的本土化與自主性⁷。

4 詹宏志，〈兩種文學心靈——評兩篇聯合報小說獎得獎作品〉，《書評書目》93期(1981)，頁23-24。

5 高天生，〈歷史悲運的頑抗——隨想台灣文學的前途及展望〉，《台灣文藝》72期(1981)，頁297-298。

6 彭瑞金，〈台灣文學應以本土化為首要課題〉，《文學界》2期(1982)，頁2-3。

7 宋冬陽〈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台灣文藝》86期(1984)，頁10-40。

這段期間政治變化所激盪出來的台灣文學定義，最完整的可能是李喬所提出的。援引葉石濤與彭瑞金的想法，李喬如此界定：

「所謂台灣文學，就是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寫台灣經驗的文學」。

所謂「台灣人的立場」，是指站在台灣這個特定時空裏，廣大民眾的立場；是同情、認同、肯定他們的苦難、處境，希望，以及追求民主自由的奮鬥目標——的立場。這個立場，與先住民，後住民，省籍等文化、政治、經濟因素無關。

所謂「台灣經驗」，包括近四百年來，與大自然搏鬥與相處的經驗，反封建，反迫害的經驗，以及反政治殖民，經濟殖民，和爭取民主自由的經驗。⁸

當《笠》與《台灣文藝》成員以上述方式來界定台灣文學時，也同時將台灣人描繪成不同的外來政權壓迫統治的受害者，以及被滿清帝國拋棄的孤兒。對他們來說，《台灣文藝》創辦人吳濁流在1945年所寫的小說《亞細亞的孤兒》已經給台灣人啓示，亦即台灣人必須覺醒，認識到他們不是中國人，而是台灣人；有如孤兒的台灣人，必須建立自信。爲了將台灣人的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區別於外省人或更廣泛的中國人的歷史經驗與集體記憶，《笠》與《台灣文藝》成員也開始強調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重要性。被殖民的歷史變成是一項「資產」，而不再是國民黨教化宣傳所汙名化的「負債」。他們相信，殖民統治與反殖民的特殊歷史經驗，使台灣文學具有漢民族所沒有的特質，脫離中國文學的脈流而形成獨特傳統。

8 李喬，〈台灣文學正解〉，《台灣文藝》83期(1983)，頁7。

總括來說，1980年代上半葉，以《笠》與《台灣文藝》成員爲主的本省籍文學界人士，致力於將台灣文學「去中國化」。他們的核心關懷，在於強調台灣文學介入現實的入世精神、抵抗意識、以及本土化的特質，將台灣文學，尤其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以來台灣(本省)人的文學發展，詮釋成與中國文學少有關連的獨特文學傳統。

1980年代下半葉之後，《笠》與《台灣文藝》成員則致力於將台灣文學「民族化」，亦即賦予台灣文學一種民族的性格，將它呈現爲一個獨特的「台灣民族」的文學傳統；而這個傳統所指涉的，比1980年代上半葉的台灣文學概念更廣泛，包括日本殖民時期之前的、以及各族群的文學表現。台灣文學也被視爲是獨特的「台灣民族」的文學。因此這些支持台灣獨立的作家與文學批評者的台灣文學論述，更進一步政治化。這種文學意識型態的激進化，是伴隨1986年底之後台灣顯著的政治變遷而來的。戰後台灣第一個反對黨民進黨在1986年9月成立、政治控制持續放鬆、台灣獨立運動快速發展、國民黨統治菁英的「台灣化」、以及台灣與中國大陸互動增長使台灣民族主義者加深憂慮等，這些因素匯合在一起，促動了將台灣文學民族化的論述發展。在1980、90年代之交，葉石濤出版的《台灣文學史綱》(1987)與彭瑞金的《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1991)，是笠詩社與《台灣文藝》成員的台灣文學論述從「去中國化」到「(台灣)民族化」的典型代表。

自從民進黨成立後，笠詩社與《台灣文藝》成員更進一步參與反對政治，成爲台灣民族主義發展的重要部分。民進黨成立不久後，這兩個團體的主要成員將具有鮮明的台灣意識的文化菁英組織起來，於1987年2月成立「台灣筆會」，以楊青矗爲首屆會長，約有130位會員，包括詩人、小說家、散文家、文學批評家、畫家、音樂家等。笠詩社與《台灣文藝》成員則爲主要會員與領導幹部，而《台

灣文藝》也成爲這個新團體的機關刊物。台灣筆會的〈成立宣言〉強調「文化運動是一切改革的根源」，因此要求「全面的文化改革」，以改善社會⁹。在台灣獨立運動快速推進的1980年代下半葉，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蓬勃發展，而笠詩社與《台灣文藝》的作家與文學評論家是主要的推動者。整體來說，這一波文化論述的最大特色，與上述文學方面的趨勢類似，在於將台灣文化「去中國化」之後再「民族化」。《台灣新文化》與《新文化》兩本雜誌的創刊(都由民進黨重要領導人謝長廷擔任社長或發行人)，代表這一波高度政治化的文化論述風潮，而這兩份新刊物與《台灣文藝》成爲台灣民族主義者傳播文化論述的主要管道。

這波文化論述有幾個重要特色。第一，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被二分對立。中國文化被描繪成僵硬的、封建的、反動的、壓迫的、定著於土地的，而台灣文化則被讚揚爲有彈性的、現代的、進步的、民主的、海洋導向的。第二個特色是強調台灣文化的多元起源。台灣歷史上非漢人的原住民文化的角色，愈來愈被強調，以顯示台灣具有特殊文化成分，不應被簡單地歸併於漢人的中國文化中。荷蘭人的殖民、西班牙人的占領、日本人的統治，也都被認爲是台灣文化特殊性的主要來源。第三，中國文化與台灣文化在歷史上的中心與邊陲的關係被翻轉。中國文化被認爲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而政治壓迫、社會沉痾、與道德淪喪等，也都被歸咎於「邪惡的」中國文化的影響所致，因此清除台灣人心靈中的中國意識，是創造台灣新文化的先決條件。第四，「文化主體性」成爲台灣民族主義者經常運用的關鍵詞，他們不斷熱切呼籲要「建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或「創造主體性的台灣文化」。

9 《台灣文藝》105期(1987)，頁6。

締造民族語言

語言一直是民族主義關於文化的核心議題，台灣民族主義進展顯著的1980年代，同樣無法迴避語言問題。在民進黨成立之前的1980年代上半葉，特別是選舉期間，黨外反對運動人士就以語言做為爭取支持的有效方法。即使是國民黨的候選人，不僅是本省籍的，也包括外省籍的，都可能講台語來打動選民。台語因此變成「選舉的語言」。在黨外人士之間，使用台語更成為表達政治不滿和族群忠誠的象徵。這段時期，黨外反對運動者提倡「台灣意識」，也開始觸及台灣的語言議題，而批評的焦點在於學校教育的「獨尊國語」政策、廣播與電視中對台語使用的限制、以及研擬中的《語文法》草案。不過這段期間黨外針對國民黨語言政策的抨擊，並未引起廣泛的重視。

1980年代下半葉，帶有福佬族群色彩的台灣民族主義迅速發展。民進黨領導的反對運動，其領導者和支持者絕大多數是本省人，尤其以福佬人為主。台語因此成為民進黨會議、群眾集會和街頭抗議時的主要語言。不過一直要到1987年，語言問題才引發社會大眾普遍的關注。這一年3月，民進黨立法委員朱高正在立法院刻意以台語發言質詢，羞辱國民黨的外省籍內閣官員和年邁的終身職立委。這件事暴露一個事實：外省籍政治菁英儘管在台灣生活了將近四十年，不但聽不懂、也無意學習最主要的本土語言。朱高正的做法引起國、民兩黨立委的嚴重衝突，也促使社會大眾熱烈討論語言問題與官方的語言政策。

在對官方語言政策愈來愈高漲的批評聲浪中，1987年8月，台灣省政府教育廳通令各國小及國、高中，不可再懲罰在學校說本土語

言的學生。同年底，三家全國性的電視頻道都在每天短暫的台語節目之外，各增加20分鐘的台語新聞時段。兩年後，其中一個頻道(台視)開始出現每週一次30分鐘的客語節目。1990年2月，南部的國立成功大學首次在國家的教育體系內開設台語課程。同年5月，行政院新聞局取消了電視節目使用本土語言的限制。

在此同時，民進黨開始努力推動小學與國中的雙語教育。1989年地方縣市長選舉中，民進黨候選人將雙語教育計畫列入競選政見。其中六名當選人開始在他們執政縣市的小學、國中開辦「母語教學」，包括台語、客家話與原住民語言。但是國民黨所控制的縣市議會經常刪除相關的預算，而本土語言缺乏標準的音標與書寫系統，也很難找到合格的教師與教材。不過儘管阻礙重重，這項語言教學計畫仍然在1990年代初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開始實施。

隨著政府對本土語言的管控放鬆，以及反對黨對雙語教育的提倡，1980年代末之後出現了本土語言復興的現象。尤其是福佬台語戲劇和電影重新出現，台語流行歌興盛，許多大學校園也組成台語和客語社團，大量的台語字典、雜誌和語言專書、論文也陸續出版。

雖然社會上出現說台語、教台語、研究台語的濃厚興趣，然而對於那些關心語言問題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來說，並不能滿足於此。從1980年代下半葉開始，許多台灣民族主義者便致力於本土語言的復興與書寫系統的創造。由於福佬人主導了台灣民族主義運動，因此這些關於語言的行動與努力，重點都在於台語。

關心語言議題的台灣民族主義者批判官方將台語定義為「方言」，指出戰後長久以來官方的認定影響了民眾的認知，不僅將國語之外的台灣本土語言貶為方言，許多人甚至將台語誤認為是以北京話為基礎的國語的一個「方言」。他們強調台語與國語雖屬相同語系，但差異甚大而無法溝通，兩者既是不同的「語言」，而從音

系結構、詞彙的精密、語法的邏輯性，乃至於能豐富地傳達日常生活的經驗來說，台語更要比國語更優越。對他們來說，一種語言的沒落，是一個族群認同所賴以維繫的傳統文化衰敗萎縮的預兆；傳統的台灣文化已經逐漸式微，受到國語所代表的中國北方文化的嚴重破壞。他們認為，國語對台灣人來說猶如外國語言，台灣的本土語言才是表現台灣獨特性的主要工具¹⁰。在這種主張下，建立一套台語的書寫系統自然成爲當務之急，對於台灣獨立而言至關重要。

中國南方的福佬人至少在數百年前就用漢字記載福佬話的民間劇本，而以漢字書寫福佬話的歷史可能更爲久遠。在台灣，以漢字寫諺語、民謠、和民間戲劇劇本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朝統治時期。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則開始以漢字來寫台語流行歌。不過由於30%的台語詞素無法用既有的漢字來記述，書寫者經常隨意借用現有的漢字，甚至自創新字。因此台語並沒有標準的書寫系統，而未經記述的那些詞素，更是缺乏固定的寫法。

1980年代下半葉以前，幾乎沒有作家以台灣本土語言寫作。笠詩社的資深成員林宗源被譽爲戰後以漢字寫作台語詩的先驅。早在1960年代，他便在國語白話詩裡加入台語的詞彙與句法。1970年代，林宗源更以「純正」的台語寫作。1976年4月，年輕的《台灣文藝》成員向陽(林淇瀟)在《笠詩刊》發表他最早的幾首台語詩，成爲另一位用台語寫作的詩人。這兩位詩人以母語寫作的動力都相當單純，亦即希望用母語更自然地表達自己的情感思想。

1980年代上半葉，一些黨外雜誌的作者撰文介紹日本殖民統治

10 例如林錦賢，〈為斯土斯民個語言做文化講一句話——兼論陳瑞玉先生個兩篇文章〉，《台灣文藝》113期(1988)，頁61-82；鄭良偉，《演變中的台灣社會語文》(台北：自立晚報，1990)；洪惟仁，《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前衛，1992)。

時期台灣知識分子提倡以漢字書寫台語、以及當時蔡培火推動台語的羅馬拼音的歷史。但就像黨外人士對國民黨官方語言政策的批評一樣，這些文章也沒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與迴響。1984年9月，在日本的台裔歷史學家許極燉，於《台灣文藝》發表一篇探討台灣語言和台灣文學關係的文章。他非常同情殖民時期作家以台語寫作的嘗試，呼籲當前台灣作家創作「台語的台灣文學」，並發展可供書寫的「台灣文學的台語」¹¹。許極燉的呼籲，令人想起在日本殖民統治下1930年代初「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亦即當時稱為台灣話的台語的書寫系統）提倡聲中郭秋生提出的口號，亦即不只是一是要創造「台灣話的文學」，也要建立「文學的台灣話」。1980年代上半葉，除了林宗源與向陽之外，另外三位本省籍作家宋澤萊（《台灣文藝》成員）、黃勁連（笠詩社成員，後來擔任《台灣文藝》總編輯）、與林央敏（後來成為《台灣文藝》編輯委員之一）也開始創作台語詩¹²。

1987年1月，宋澤萊在《台灣新文化》雜誌發表一篇用台語寫作的文章〈談台語文字化問題〉。這是戰後本省籍作家第一次公開提倡以台語寫作。宋澤萊呼籲台灣作家進行台語創作的實驗，批評用台語以外的語言寫作，對於台灣本土文化的復興沒有什麼貢獻。他認為，從「鄉土文學」演變到葉石濤、彭瑞金、陳芳明和李喬所定義的「台灣文學」，再從「台灣文學」演變到台語文學，是必然發生的¹³。1987年之後，隨著反對運動人士愈來愈挑戰官方的單語政策，以及國民黨政府對公開使用本土語言的監控逐漸放鬆，愈來愈

11 許極燉，〈台灣文學需要充實的維生素——泛談台語與台灣文學的關係〉，《台灣文藝》90期（1984），頁29-46。

12 見林央敏，《台灣文學運動史論》（台北：前衛，1996），頁23。

13 宋澤萊，〈談台語文字化問題〉，《台灣新文化》5期（1987），頁38-41。

多作者開始用台語寫作，刊載於《台灣文藝》、《笠》、《文學界》、《新文化》、《台灣新文化》、《自立晚報》、《民眾日報》等。

從1989年到1995年間，至少有12個社團組織成立，以復興本土語言、設計台語書寫系統、和提倡台語文學為目的。這些社團組織的成員經常相互重疊，且一般而言，他們彼此間的往來也十分密切。這些社團組織都有自己定期出版的刊物，不過這些刊物大致上發行不廣、流通有限¹⁴。由林宗源、黃勁連與林央敏等人所建立「蕃薯詩社」，便是其中之一。做為戰後第一個推動以本土語言寫詩的詩社，蕃薯詩社列出下列寫作準則：一、使用台灣本土語言（包括台語、客語、與先住民母語），創造「正統」的台灣文學；二、提倡台語書寫，提升台語文學與歌詩的品質，追求台語的文字化與文學化；三、表現社會人生、反抗惡霸、反映被壓迫者與艱苦大眾的生活心聲；四、創造有台灣民族精神與特色的新台灣文學作品。這些準則可以說綜結了1980年代下半葉之後提倡台語文學人士所共有的理念¹⁵。

就像殖民時期鄉土文學與台灣話文的提倡一樣，1980年代末之後企圖建立台語書寫系統的努力，和台語文學的提倡無法分開。也只有在1987年之後以台語寫作的作者逐漸增加時，建立標準台語文字的問題才獲得比較多的關注。1980年代下半葉之後，關於台語書寫系統，出現各種不同的看法與提議。相關的技術問題，例如如何挑選適合的漢字，經常引起辯論。各方的理念與提案，都積極地爭取社會的認可。第一，有些人主張全盤放棄漢字，並鼓吹以拼音系統來書寫台語。他們試圖改進西方傳教士發明的台語羅馬拼音系統。化學教授林繼雄是積極推廣這類主張的代表人物。第二，另外

14 見林央敏，《台灣文學運動史論》，頁96。

15 見林央敏，《台灣文學運動史論》，頁98。

一群人主張以漢字來書寫台語，是唯一實際可行的方法，而那些無法以既有漢字表示的台語詞素可依據漢字部首來創造新字。在日本的台裔語言學家鄭穗影，是這個理念的主要提倡者。第三種方案結合了漢字與拼音字母的書寫方式，用羅馬拼音來書寫那些無法以漢字標記的詞素，夏威夷大學的台裔語言學教授鄭良偉是這個方案的主要倡導者。1980年代末之後，這是台語寫作的最普遍方式。第四種提案的主張者洪惟仁，則認為韓國諺文比起羅馬拼音字母，在圖形構成與視覺上更能與漢字搭配。因此漢字與改良後的韓國諺文並用，是最好的台語書寫系統。

從比較的角度來看，1980年代末之後試圖建立台語書寫系統與台語文學的嘗試，要比日本殖民時期推動台灣話文與鄉土文學的努力，有更多的進展。一方面，1930年代初的提倡者仍懷有相當強烈的漢文化意識。因此除了蔡培火為特例之外，其他人都支持用漢字書寫台語，以維繫台灣人與中國大陸及漢文化的關連。對於當時這種主張的重要領導者郭秋生而言，台灣話文「……純然不出漢字一步，雖然超出文言文體系的方言的地位，但卻不失為漢字體系的較鮮明一點方言的地方色而已的文字」¹⁶。然而如何選擇「正確」或「較佳」的漢字，或者甚至創造新字來表達那些無法用漢字表述的詞素，這些難解的技術問題，阻撓了殖民時期的台語創作實驗。相較之下，那些致力於建構獨特的台灣文化、在1980年代末以來主張書寫台語的提倡者，幾無例外地都是台灣民族主義者。他們大部分不再執著於漢字，並且自由地將某些台語詞素轉為羅馬拼音。主張

16 見廖毓文，〈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1954, 1955），收錄於李南衡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台北：明潭，1979），頁491。

完全以羅馬拼音書寫台語的陳明仁，同時也是笠詩人和台灣筆會、蕃薯詩社的成員，他曾經如此說：

一個無家己文字的民族是無未來的民族，尤其台灣若欲行向一個獨立的國家，台語文字化的需要性更加迫切。但是伊[漢字]所負載的文化意涵嘛有真負面的封建思想。……一個人若無獨立、成熟的思考，去接觸著古早漢字的冊，意識型態佇不知不覺中會去予污染著。這是筆者從事台灣建國運動上大的煩惱，嘛是主張漸廢漢字的主因。¹⁷

將台語羅馬拼音化不僅讓台語寫作更為容易，也促進了台語文學的發展。拼音文字的採用，代表著以中國為主的古老表意文字地區(包括韓國、日本和越南等中國周邊國家)中，地域認同邁向民族主義的重大變化。近年來電腦科技的進步，尤其是幫助使用者選擇漢字或羅馬拼音字的台語文書處理軟體，更是台語書寫得以發展迅速的重要因素¹⁸。

1980年代末之後愈來愈多的作家嘗試以台語寫作，使得作品所運用的語言與台灣文學概念之間的關係，逐漸成為議題。一些福佬作家和文學批評家，開始從語言的觀點重新定義台灣文學(例如前面提到的宋澤萊的看法)，甚至有人認為只有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

17 陳明仁，〈「台灣語文復興運動」引言補充資料〉，《台灣文藝》133期(1992)，頁138-139。

18 教育部協調了各種台語拼音設計，終於在2006年10月公告了「臺灣閩南語羅馬字拼音方案」，並於2007年5月後陸續整合公告「臺灣閩南語推薦用字」，接著推出《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網路版供大眾使用。這些都使得台語文字化與書寫，又變得更為一致與便利。

因此使客家作家與評論家覺得受到排斥。面對著福佬人所領導的政治反對運動快速發展，以及台語復興運動的活躍，許多客家人也擔心他們本身與自己的語言可能再度被邊緣化。1988年，客家人發起「還我客語」運動，要求客語電視節目，但只爭取到每週在一家全國性頻道上播映半小時的客語節目(台視的「鄉親鄉情」)。1989年，客家人反國民黨與反福佬人的情緒高昂，不只抗議國民黨的「一黨獨大」，也抨擊民進黨的「福佬沙文主義」。當時出現了試圖組織「客家黨」的行動，但最後沒有成功¹⁹。

書寫民族歷史

1980年代所出現對於語言問題與文學發展的不同看法，都與人們對台灣歷史的不同理解密切相關。從1947年二二八事件結束到1960年代，海外反國民黨的台灣人已經建構他們自己關於台灣的歷史敘事，並加以出版，用來闡述他們的政治主張。其中最著名的是蘇新的《憤怒的台灣》(1949)、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1962)、以及王育德的《台灣：苦悶的歷史》(1964)。雖然他們三人的政治理念差異很大，但都強調是從台灣人被統治與被壓迫的立場闡述台灣史，以取代統治者和壓迫者(包括來自西方、中國與日本的殖民政權、以及國民黨政府)的觀點。不過在1980年代末之前的台灣，他們的著作都被列為禁書，只能私下閱讀，對於1980年代之後台灣史政治化的影響也有限。

19 到2012年2月為止，依照《人民團體法》規定向內政部備案的有(括號內為成立時間)：客家黨(2006年10月)、台灣新客家黨(2007年2月)、中華客家黨(2010年2月)、世界客屬黨(2011年3月)。

「台灣史觀」公開浮現，主要起因於國內重大的政治變化，特別是美麗島事件，而非來自上述海外台灣人異議者的歷史論著²⁰。美麗島事件導致1980年代上半葉政治反對運動激進化，黨外人士此時提倡的台灣意識，主要以重新詮釋台灣史為基礎。他們試圖改變台灣民眾的集體記憶，爭取他們的支持。台灣史觀事實上是由黨外人士所引領倡導的。他們既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中國意識，也批判以左派自居的異議人士的中國意識，尤其是圍繞在《夏潮論壇》雜誌而以陳映真為代表的人士。儘管陳映真等人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資本主義經濟政策，指摘它過度依賴「帝國主義勢力」（尤其是美國），但對黨外人士來說，這些左派人士與國民黨同樣堅持中國民族主義、追求中國統一，所以沒有太大差別。1983年的「台灣意識論戰」，主要發生於《夏潮論壇》作者群和屬於黨外激進派的《生根週刊》作者群之間，雙方都經常譏諷對方對台灣史的「無知」或「扭曲」，宣稱自己的理解更為全面、客觀與正確²¹。一般而言，國民黨政府與左派異議人士都強調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的類似，以及歷史文化上的密切關係，而黨外人士則突顯台灣的獨特性以及特殊的歷史發展道路。黨外政論雜誌，經常可見以1945年之前台灣歷史為題的文章。例如《生根週刊》即是如此，而這份刊物也登載一系列「大家

20 見張炎憲，〈台灣史研究的新精神〉，《台灣史料研究》1期(1993)，頁84。

21 例如宋冬陽，〈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台灣文藝》86期(1984)，頁10-40；戴國輝，〈研究台灣史經驗談〉，《夏潮論壇》12期(1984)，頁29-35；吳德山，〈走出「台灣意識」的陰影——宋冬陽台灣意識文學論底批判〉，《夏潮論壇》12期(1984)，頁36-57；秦琦，〈神話與歷史，現在與將來——評「夏潮論壇」對黨外的批判〉(1984)，收錄於施敏輝(陳芳明)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北：前衛，1988)，頁173-184。

來學台灣話」的文章，教導讀者認識台語。又如黨外溫和派領袖康寧祥主持的《八十年代》雜誌，也在1983年之後陸續刊出一系列的文章介紹台灣史。在這段期間，台灣史於是逐漸政治化。

1980年代上半葉，黨外政論雜誌以大量的篇幅重新挖掘日本殖民統治史，特別是台灣人的抗日運動。這些歷史討論強調，黨外的反國民黨運動是台灣人長久以來反抗異族統治的傳統的一部分²²。這意味著國民黨和日本殖民政府一樣，都是「外來政權」。這些文章認為，雖然台灣人的抗日鬥爭完全失敗，但是台灣人在殖民統治期間已發展出對台灣的特殊認同感，而與他們對中國大陸的認同不一樣。許多黨外雜誌作者認為，日本人帶來的現代政治統治與經濟發展，使漢人移民原先基於中國大陸原鄉(漳、泉、粵)情懷所產生的群體界線，逐漸模糊淡化，因此使眾多的地方社群融合成爲一個全島性的社會，台灣人的共同體感受也逐漸浮現。他們以讚賞的口吻談論日本人推動的社會經濟現代化，強調台灣意識對抗中國意識的正當性。對於提倡台灣意識的黨外人士來說，日本的殖民統治事實上是一項寶貴的資源²³。如同前面提到的，受到政治劇變與黨外影響的《笠》、《台灣文藝》的文學界人士在當時的傾向也是如此。

黨外更批判整體的中國史觀，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國民黨宣稱「台灣在歷史上是中國的一部分」，代表傳統的「帝王史觀」或「天朝史觀」，而這種史觀又來自「中國沙文主義」或「漢人中心

22 例如顏尹謨，〈日據時代與國民黨統治下反對運動模式〉，《政治家》16期(1984)，頁60-64；參照施敏輝，〈《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序〉(1985)，收錄於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北：前衛，1988)，頁1-7。

23 例如施敏輝編的《台灣意識論戰選集》(1988，台北：前衛)中所收錄的陳樹鴻、高伊哥、林濁水、施敏輝的文章。

主義」²⁴。爲了駁斥這種政治宣稱與史觀，黨外政論雜誌特別探討原住民的古老歷史，並且強調漢人移民征服、剝削原住民的經過，以表示他們認同於被壓迫的原住民，並且與做爲壓迫者的漢人劃清界線。在這種歷史敘事中，做爲外來政權的國民黨政府，正是當前施加中國沙文主義和漢族中心主義的來源。

一些黨外雜誌作者更進一步挑戰所謂台灣人(包括福佬人與客家人)是純種漢人的說法。「平埔族」被同化而融入早期漢人移民社會，特別是早期來自中國大陸的男性移民與平埔族女性的通婚，使得台灣人的血緣混雜而異質。黨外雜誌作者強調原住民扮演的角色，提倡以「本土化」的角度理解台灣的過去，書寫「台灣人觀點的台灣史」。他們相信，闡述台灣史時，唯一能夠擺脫中國沙文主義和漢人中心主義的正確參考架構，就是台灣人民賴以立足的這塊土地。高伊哥批判《夏潮論壇》作者群的文章，是這種本土化觀點的典型陳述。他強調：

對於現代的臺灣人而言，不論他是福佬人、客家人、高山族，以及大多數早被同化而僅少數還保持原貌的平埔族，數百年的種族鬭爭史不必迴避，也不必刻意分化，造成彼此的敵視。這三個種族數百年來都共同面臨一個接一個外來「頭家」的殘酷統治，而在共同的命運下，認同這塊土地上的社會＝經濟共同體，一起創造歷史、繁衍子孫。

這個雜揉著漢文化、日本文化及馬來文化的社經共同體，在外

24 例如高伊哥，〈台灣歷史意識問題〉(1984)，收錄於施敏輝編，《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台北：前衛，1988)，頁167；施敏輝(1985)〈《台灣意識論戰選集》序〉(1988)，頁4。

來帝國主義的侵略壓力下逐漸成長，並隨著統治力的轉換而變動。這就是臺灣歷史發展的客觀條件。認同這塊土地，以臺灣人自居，就是主觀的臺灣歷史意識。……

又為何必須在「臺灣人」之上，必然地有「中華意識」存在？那麼平埔族、高山族和漢人的混血後代又該認同誰呢？為什麼必須以這種「上位意識」強壓自己的同胞？²⁵

綜合來說，在1980年代上半葉，黨外人士對台灣的過去，發展了一套堅定而全面的闡述，用來對抗中國史觀的敘事。對他們而言，台灣史就是一部殖民與反殖民、壓迫與抵抗的歷史，長久以來台灣人民是殖民與壓迫下的受害者，而台灣意識就是一種被壓迫與抵抗的意識、是鼓舞民眾反國民黨鬥爭的核心動力。這樣的歷史敘事，經常闡揚台灣人的抗日運動與早期的原住民歷史。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數年間，黨外人士重新塑造台灣人受難與抵抗的集體記憶，這影響了往後反對運動的基調。1980年代上半葉，他們重寫台灣史，對此後台灣民族主義的迅速開展相當重要。就像前面討論過的，黨外人士的獨特史觀的影響，明顯反映在《笠》與《台灣文藝》這兩群作家身上，而美麗島事件後的那幾年，圍繞在《笠》與《台灣文藝》的兩群文學界人士也與黨外建立密切關係。就像黨外雜誌作者致力於將台灣的歷史認識本土化一樣，《笠》與《台灣文藝》的作家與文學評論家也追求台灣文學的本土化。從1983年開始，李筱峰、李永熾、鄭欽仁、陳芳明、張炎憲、楊碧川等多位專業的或業餘的歷史學者，陸續加入《台灣文藝》雜誌社，成為「本社同仁」或擔任編輯委員。同時也從1983年開始，大約到1985

25 高伊哥，〈台灣歷史意識問題〉，頁167-168。

年初，這份文學雜誌幾乎每一期都出現「台灣史料溫習」、「台灣歷史人物」、「台灣人物回顧」、「台灣歷史叢談」等專欄，討論台灣的歷史人物與事件，尤其是屬於日本殖民時期者。此後上述的歷史學家，特別是陳芳明與張炎憲，都成為台灣史觀的主要提倡人物，陳芳明更是台灣意識與台灣文學本土化的熱情倡導者。

隨著1980年代上半葉黨外人士積極提倡台灣意識，以及1986年之後明顯的政治自由化，包括台灣民族主義的快速發展、執政的國民黨的台灣化等轉變，台灣史的學術研究，以及學術界廣泛的台灣研究，都蓬勃發展。人文學者與社會科學家對日本殖民時期與戰後台灣的興趣快速增長，平埔族的歷史與文化也受到特別的關注，而愈來愈多的研究生也投身於台灣史或台灣研究。這些都反映了追求明確的集體認同的普遍渴望。

1980年代中期之後，台灣史研究的方向深受支持台灣獨立的歷史學家的影響，那些與《台灣文藝》作家群關係密切的歷史學家影響力尤其顯著。1983年9月，鄭欽仁在《台灣文藝》發表的〈台灣史研究與歷史意識之檢討〉一文，是當時清楚解釋「台灣史觀」的先驅。這篇文章代表台灣史研究已準備邁開新的步伐，也見證了1980年代上半葉黨外人士的倡導對歷史研究者的深遠影響。鄭欽仁認為，台灣史的研究不能受限於中國史的觀點，唯有以世界史的觀點才能看到台灣在過去與未來所扮演的角色，摸索出台灣自立生存之道，擺脫周圍強權的糾葛。他指出以政權統治而斷代分期「政治史觀」是落伍的，台灣史家必須思考歷史的主體性，以「我們·人民」為歷史主角，而歷史也是為「我們」而寫。鄭欽仁批評，在戰後台灣，「中原文化本位主義」是錯誤的統治理念的一部分，既造成許多不幸事件，也使歷史教育無法培養國民合理的觀念；台灣的歷史教育過度強調中央集權、中國統一而忽略地域性、造成政治不安。

他認為，「漢族沙文主義」正基於中原文化本位主義與中央集權觀念。鄭欽仁進一步強調，歷史上中國大陸的「大陸型文化」是內向的，台灣的「海洋型文化」是開放的，兩者有顯著差異；台灣先天的海國條件下的國家體制應該是自由、開放與進取的，但現有的國家卻在精神上、意識上加以否定。他特別強調，台灣數十年來地方意識的高昂是自然的事情，「落葉歸根有利於目前政權的穩定」，「更無須惶惑」。1980年代上半葉之後，支持台灣獨立的歷史學者提倡的台灣史觀，大致上沒有超越鄭欽仁上述文章的論點。「建立台灣主體性歷史觀」或「重建台灣歷史主體性」，成為他們流行的關鍵用語。1995年2月「台灣歷史學會」成立，李永熾擔任首任會長。

1980年代中期之後，嘗試重塑台灣人集體記憶的各種努力中，最令人矚目的莫過於挖掘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歷史真相，以及探索平埔族原住民的歷史。首先，1980年代中期之後政治反對運動人士與歷史學者挖掘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延續了黨外在1980年代前半葉的作為，亦即致力於將台灣的過去闡述為殖民與反殖民、受難與抵抗的歷史。雖然黨外政論雜誌曾經努力挖掘事件真相，但一直要到1987年2月「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成立之後才破除歷史禁忌，使這個事件得以成為公共議題。在曾任《台灣文藝》社長的陳永興帶領下，這個組織集合了許多民進黨領導人物與支持者，包括《笠》、《台灣文藝》、《文學界》、《台灣新文化》、台灣筆會等文學或文化團體，並且發動一連串群眾集會與街頭遊行，要求國民黨政府公布事件真相，替國民黨軍隊大屠殺下的受難者平反冤屈、恢復名譽。黨外人士在1980年代上半葉所發展出來對台灣史的全面闡述，被用來解釋戰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而追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使得台灣人「受難與抵抗」的象徵與修辭更加發展。

再者，1980年代中期以前，極少人重視平埔族歷史，戰後人類

學家對台灣原住民的研究也偏重山地原住民。一直要到1980年代中期以後，平埔族的歷史才引起廣泛注意。此後平埔族的歷史與文化，在學院專業的與民間業餘的歷史學者、民俗學家、和人類學家等之間，成為流行的研究題材。這又影響了台灣的族群意識，使愈來愈多的福佬人和客家人開始尋根，發現自己有著平埔族的血統，宣稱自己是平埔族。不少被認為屬於平埔族部落傳統的祭祀儀式和慶典活動開始出現，其中有重新舉辦的，也有可能包括許多創新成分的。許多平埔族的領導人物，也著手書寫自己部落的歷史。他們同時也向政府要求，自己的族人應該與山地原住民一樣擁有相同的權利，例如擁有特定的保留區。1991年7月，搶救平埔族凱達格蘭人「十三行文化遺址」的運動訴求，特別是「去中國化」、多元文化的傾向，以及「由下而上的歷史」的理念，正是台灣史觀的典型縮影，也具現了台灣史觀漸增的影響力。隨著1980年代末社會大眾普遍接受「四大族群」、命運共同體、族群平等與多元文化主義等理念，平埔族歷史的重新發現有了新的意義。它不只用來挑戰中國民族主義立場、質疑從中國角度詮釋台灣史的方式，同時更有助於一個新的台灣人認同的形成。愈來愈多人認為自己是平埔族，這種現象促進歷史意識的本土化，促使人們將台灣當做有別於中國的命運共同體。挖掘消失部落的歷史，認同它們，有利於人們將台灣想像為一個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國族，亦即「大家都是台灣人」（1990年代開始，國民黨與民進黨都經常運用這個口號），雖然分屬不同族群，但都團結凝聚在一個國族的架構之下。

歷史的復現？

以本省籍人士為主的政治反對運動，歷經黨外時期到成立民進

黨之後的三十年左右對國民黨統治的挑戰，終於在2000年由陳水扁、呂秀蓮當選為總統、副總統，使掌握政權超過半世紀的國民黨成為在野黨，也使戰後台灣出現第一次的政黨輪替執政。歷經民進黨陳、呂兩個任期八年的主政，2008年由馬英九、蕭萬長贏得總統、副總統選舉，國民黨重新取得政權，此後的文化教育政策開始改變，試圖扭轉民進黨主政時期的方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高中國文與歷史兩科的課程綱要修訂。2008年9月，亦即馬英九就任總統的四個月後，教育部宣布高中國文科課程綱要未來修訂原則為「酌增節數，增加學生修習文化經典教材」、「教材配置酌增文言文比例」。2010年9月，教育部宣布高中國文科的文言文範文比率，將從原來的45%，提高到45%至65%(從2012年秋季的學年開始實施)。2011年5月，高中歷史課程綱要定案，雖然教育部不得已將原來上溯台灣史到三國時代的規劃改列為「探討台澎早期歷史的文獻紀錄」，但將原來授課比重的台灣史一學期、中國史一學期、世界史二學期，改為台灣史一學期、中國史1.5學期，世界史1.5學期，增加中國史的份量(從2012年秋季學年的高一學生開始實施)。2011年3月，馬英九總統兼任名譽會長的「國家文化總會」，改名為「中華文化總會」。2011年6月教育部將以儒家「四書」為主的「中華文化基本教材」列為高中必選課程。2011年9月馬英九提倡「讀經」。

從2008年夏天開始，上述的變化經常引起支持台灣民族主義的「本土派」人士的批判與抗議。包括台灣社、台灣北社、中社、南社、東社、客社、青社、台灣教師聯盟、台灣教授協會、教育台灣化聯盟、公投護台灣聯盟、搶救台灣行動聯盟、台灣國家聯盟、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台灣母語會等，加上民進黨及其立法委員，經常發表聲明、召開記者會、或到教育部公開抗議，批判國民黨執政者企圖走回頭路，將教育再度「中國化」、「去台灣化」。2011年底，

上述團體等也聯合抨擊教育部取消推行多年的國中小學等「台灣母語日」的訪視與補助經費、將負有推動台灣母語任務的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層級降低、削減補助台灣母語教學的經費等。

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上述在教育、文化、歷史、語言等方面引起的爭論，以及台灣民族主義支持者不斷的批判抗議，許多場景非常類似1980、1990年代台灣文化主體性理念高張、台灣民族主義者挑戰國民黨的情境，彷彿又讓台灣回到那個時期。2008年夏以來的現象，見證了台灣民族主義自1980年代以來的重大影響，也顯示國族認同與相關的文化趨向導致台灣社會明顯的分歧。當然，最近幾年與1980、1990年代的一個明顯不同是：兩岸愈來愈密切的交往，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因素，對於台灣內部的政治與文化紛爭的影響，要比1980、1990年代更大、更直接。對關注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台灣民族主義者來說，馬英九領導的國民黨政府在文化上的作為，不再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爭，反而是互相唱和。台灣社社長吳樹民所言，可以說直接了當地歸納了這樣的強烈批判：「國民黨的教育政策，滅亡台灣史、滅亡台灣文學、滅亡台灣語言，正好確證其滅亡台灣，併入中國的本質」²⁶。中國因素對台灣社會的影響增強，使我們更有必要了解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

捷克歷史學家 Miroslav Hroch 研究中歐、東歐受宰制的弱小族群演變成民族的過程，他提出的創見，影響廣泛。Hroch指出，一個民族主義運動常見的三個基本發展階段是：從(一)知識分子致力挖掘、闡述、宣揚潛在的民族語言、文化、歷史特質，到(二)許多活躍分子的小團體具有組織性的政治行動、致力於喚醒人們的民族意識，然後又發展到(三)較具規模的群眾動員與運動。不過Hroch

26 《自由時報》，2009年10月16日，「自由廣場」版。

也強調，民族建構的歷程並非預先注定或無法逆轉，它可能被中斷，或者在沉寂一段時間之後又重新出現，而且三個階段中的每個階段的發展強度和時間長短，都依個案而相當不同²⁷。同時也如英國學者John Breuilly曾經指出的，「民族主義信條與民族主義政治，經常出現於那些大多數民眾沒有任何強烈或獨特的民族認同的社會與地區」。反之我們也能找到一些例子，「在那些地方即便擁有普遍共享的民族情操，但卻未與民族主義信條的充分發展，或與重要的民族主義政治運動的出現有所關連」²⁸。人類歷史的進展充滿機遇，矛盾可能並存，明暗往往糾纏而悲喜難測。中國的重大影響，以及國際強權之間關係的牽扯，使台灣的一切更複雜。這個東亞的大島仍然在歷史的苦海怒濤中航行，未知下錨何處、定泊何方。

蕭阿勤，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著有 *Contemporary Taiwanese Cultural Nationalism* (2000)、《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2010)，即將出版《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2012)。目前正研究台灣1960年代「中國現代化」的社會科學研究與國族敘事、文化創傷、世代及省籍的關係。

27 Miroslav Hroch,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Social Composition of Patriotic Groups among the Smaller European Nations*, translated by Ben Fowke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178; Miroslav Hroch, "From National Movement to the Fully-formed Nation: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in Europe," (1993) in *Mapping the Nation*, edited by Gopal Balakrishnan (London: Verso, 1996), p. 79, 81.

28 John Breuilly, "Approaches to Nationalism," (1994) in *Mapping the Nation*, edited by Gopal Balakrishnan (London: Verso, 1996), pp. 147-148.